

[封面故事]

# 凌家滩文化玉器断想

徐琳

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玉器



2024年12月14日,“文明先锋——凌家滩文化玉器展”在故宫博物院文华殿开幕。展览展出了故宫博物院和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博物院、含山博物馆、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管理处5家考古文博单位的400件展品。展览中既有我们熟知的凌家滩遗址出土的重要玉器,也有相当多首次露面的玉器,其中就包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102件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器。

在筹备展览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思考一些玉器的纹饰含义及使用功能,也尝试对一些重要玉器进行新的解读。

## 玉版还是玉签?

1987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凌家滩遗址进行了初次试掘。在这次发掘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一座非常完整且重要的墓葬(4号墓),编号为87M4。这座墓葬一共出土了145件(组)器物,其中玉器数量最多,共103件(组),还有石器30件,陶器12件。<sup>[1]</sup>这是目前凌家滩遗址除2007年发掘的23号墓(07M23)外,出土器物最多的一个墓葬。

1993年,机缘巧合之下,故宫博物院收购了安徽省考古研究所发掘的一批凌家滩玉石器,里面就包括了4号墓出土的器物,墓中大多数玉石器入藏故宫博物院的文物库房,其中就有最为著名的玉龟和玉版。它们出土在墓穴偏上方中部,约在墓主人腹部位置。从目前仅有的一件出土时的照片看,玉版似乎是夹在玉龟的上下腹甲中间,因为这件玉龟并非完整一块玉料雕琢,而是由龟背甲和龟腹甲两个玉片组合而成。玉背甲长9.4厘米、宽7.6厘米、厚0.8厘米,玉腹甲长7.9厘米、宽7.5厘米、厚0.5厘米。背甲上钻8个小孔,腹甲上钻5个小孔,上下两片玉甲的小孔正好相对,可以合成一个完整



凌家滩遗址墓葬87M4中的玉龟与玉版出土情况

图片转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

的玉龟甲。另外,为了合体时更为牢固,治玉者特意在背、腹甲两侧所对两孔之间琢出凹槽,显然可将绳索嵌入其中,从而牢牢将龟腹、背甲连为一体。不过,因发掘时考古人员认为同时发现的玉版是夹在玉龟背腹甲之间的,所以这一观点一直以来成为人们的共识。

2007年在发掘23号墓(07M23)时,在墓主人的腹部也发现了3个玉质扁筒形器,其中一个为玉龟甲形状,只是相对87M4出土的玉龟更为简化<sup>[2]</sup>,由此可推测另外两个圆筒形器是玉龟的更简化版。三件玉器出土时内部均有玉签,带有钻孔。此类带签的玉质龟很可能为占卜用器。占卜摇动时,玉签碰撞玉龟壁会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

由此,再回头审视87M4,在发现玉龟版的右上方,其实也有一个带有穿孔的玉签,编号为87M4:36,考古报告称之为玉簪,它长8.5厘米、宽1.2厘米、厚0.7厘米。笔者参考07M23出土的玉龟签,将这件玉签放入玉龟背腹甲之中,发现长短、大小非常合适,玉签穿孔和玉龟腹甲上穿孔相吻合,可以系绳于一体,且玉签长度也正好可以纳入玉龟背甲之内,将这三件玉器合为一体,与07M23出土玉龟签非常相似和吻合。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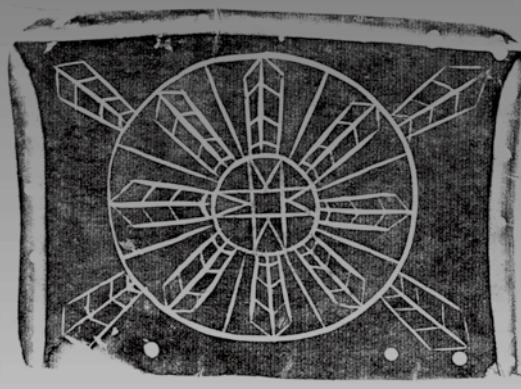
凌家滩文化 玉龟背甲  
长 9.4 厘米 宽 7.6 厘米 厚 0.8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4:29



凌家滩文化 玉龟腹甲  
长 7.9 厘米 宽 7.5 厘米 厚 0.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4:29



玉龟背甲、龟腹甲连为一体的状态



凌家滩文化 刻图长方形玉版及拓片  
长 11.4 厘米 宽 8.3 厘米 最厚 1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4:30



07M23 墓主人腰腹部出土的三个玉质扁筒形器及玉签

图片转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年第3期

此，笔者认为这件玉签原应夹在玉龟背腹甲之间，而刻有八角星图案的玉版则是放在旁边或者玉龟的上下，而非放在背腹甲中间。只是因为玉龟背、腹甲并非像 07M23 出土玉龟似的为完整一体，在系绳腐烂后，随着 5300 多年的地质变迁，器物发生移位，使得发掘时考古人员看到的现象似乎是玉版夹在玉龟背腹甲之间了。

另外，还有一个经常被大家忽视的关键点。玉版的尺寸为长 11.4 厘米、宽 8.3 厘米、厚 0.7 厘米，如果按照玉版夹在玉龟背腹甲之间进行复原，明显看出玉版尺寸大于玉龟背腹甲，不仅穿孔处无法吻合，夹在中间的玉版也阻隔了玉龟背腹甲，使之无法用绳系为一体。而且如果玉龟原本是夹着玉版使用，那么玉龟背腹甲上的系绳凹槽完全没有必要琢刻。

综上，87M4 出土的这件玉龟背、腹甲内置的应该是同墓出土的玉签，而非八角星纹玉版。八角星纹玉版和玉龟可能有组合使用的关系，但并非内置于玉龟背腹甲之中。

以龟占卜的现象在早期中国其他考古学文化中时有发现，一些墓地用龟和龟壳随葬的现象很多。早在距今 8000 年前的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中就发现有龟背、腹甲成组同出的现象，龟甲内往往装有大小、颜色不同，形状各异的小石子。其他如大汶口文化刘林遗址、重庆巫山



凌家滩文化 玉签

长 8.5 厘米 宽 1.2 厘米  
厚 0.7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

此件考古报告中编号为 87M4:36，  
被称之为玉簪



凌家滩遗址墓葬 87M4 中出土时的玉龟与玉版组合状态  
可以看出，玉版尺寸明显大出玉龟背、腹甲



作者推测墓葬 87M4 出土的这套玉龟背甲、龟腹甲、玉签实际使用时的组合状态：玉签应夹在玉龟背腹甲之间（而刻有八角星图案的玉版则是放在旁边或者玉龟的上下，而非放在背腹甲中间）

的大溪文化、河南淅川下王岗半坡文化以及江苏马家浜文化中也有葬龟习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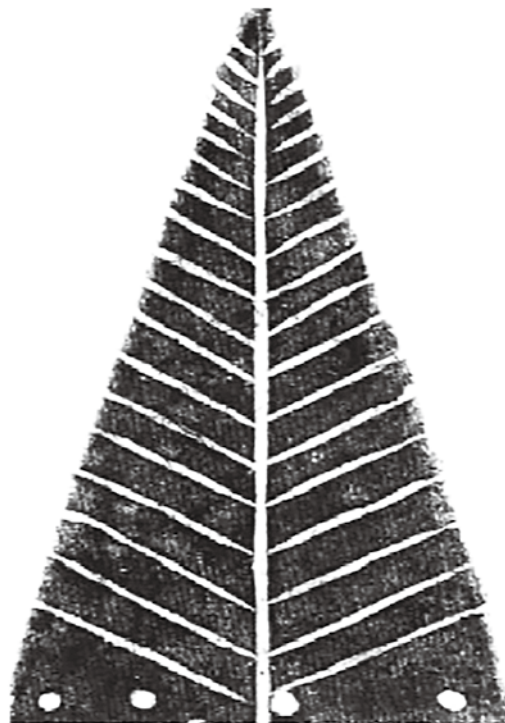
古人认为龟长寿，视为灵龟。具体卜筮的方式目前还不清楚，但用龟占卜的习俗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到夏商周时期出现了用龟版或兽骨占卜的方式。《史记·龟策列传》曰：“**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蓍龟。**”殷墟发现大量的甲骨即是证明，只是占卜的方式有所改变，即先命龟，告以所卜之事，再灼其龟甲而观其兆，以测吉凶。

当然，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玉龟、玉签的组合方式，也可能有另外一种使用方法：就是将玉签作为铃舌使用，摇动后玉签撞击玉龟壁，发出悦耳的声音，从而让上天或神灵听到。这可能是某种祭祀场景下使用的方式。

## 玉神树形饰

在 87M4 中，玉龟版右边斜放着一个玉三角形饰，器高 10.3 厘米、宽 6 厘米、厚 0.5 厘米。正面阴线雕琢叶脉纹，下有四个穿孔，反面平整，光素无纹。从器形看，似是可以通过穿孔将其固定在某种器物之上。

这件玉器在报告中定名为三角形饰，认为雕琢的是树叶的形状。不过现在重新审视这件玉器，其出土位置紧邻玉龟版，显然也在墓主人腰腹部，重要性不言而喻。另外，在整个凌家滩出土的玉器中，这件玉饰的尺寸算是较大的。凌家滩 07M23 出土的大玉猪，虽然命名为玉猪，不过经过故宫文保科技部同事们用多台仪器综合无损检测，发现其虽然检测出部分透闪石的成分，但还有不少纳闪石、石英岩质矿物等，是一个矿物集合体，只能算是玉化程度并不高的玉器，和整个凌家滩遗址出土的真正透闪石玉材质并不相同。而这件三角形玉器，



凌家滩文化 神树形玉饰及拓片  
高 10.3 厘米 宽 6 厘米 厚 0.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87M4:68-1

是用真正完全的透闪玉玉料制作。如此，这件三角形饰所用的玉材算是较大的。用珍贵难得并相对较大的玉料制作的玉器显然不会只是一片树叶那么简单，而更像一棵树，一棵凌家滩人眼中的神树。

神树形器物在考古学遗址中常有发现，如安徽蚌埠双墩遗址，是一个距今 7300 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出土的一件陶碗外底发现有刻划神树形象的纹饰<sup>[3]</sup>，如凌家滩 87M4 出土者一样没有刻划出树干。汉代的一些石椁墓和画像石上也有许多类似三角形的简略树形装饰，例如安徽淮北市出土汉画像石墓中发现带有神树纹的画像。<sup>[4]</sup>从汉代的这些三角形图案看，明显为树形，其上半部三角树形和凌家滩出土的这件玉器一模一样，但是已将树干完整地表现出来。淮北出土的画像石表达的为后羿射日的传说，右边是神鸟栖息的扶桑树，而左边三角形树上停留了一只三足乌，代表日，由此也证明它是一棵通天的神树。据此推测凌家滩这件玉饰原来下面应该有树干，可能用木质或骨质等其他有机材质与玉饰相连，日久腐烂不见，只留下玉神树的树冠。

凌家滩的玉神树形饰归属于 87M4，此墓中



新石器时代 陶碗及外底刻划纹饰拓片

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出土

图片转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 年，彩版 66-3、第 341 页

安徽淮北市汉代画像石墓石  
椁壁上纹饰拓片  
淮北市博物馆藏





凌家滩文化 玉鹰（正、背）  
高 3.6 厘米 宽 6.3 厘米 厚 0.5 厘米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凌家滩遗址墓葬出土，编号 98M29:6



不仅出土玉龟版，也出土有成套的玉璜、玉冠状饰、玉璧、玉石钺等众多带有礼仪性质的玉器。由此推测墓主人身份地位极高，很可能是凌家滩一位具有观象授时能力和拥有占卜权利的专职大巫师，也是远古时期最高等级的知识分子，而这件玉神树很可能被墓主人作为沟通天神、宇宙的桥梁，成为凌家滩人眼中神圣而寄托精神信仰的圣树。

### 鹰熊刻佩拟英雄

在 1998 年发掘的 29 号墓（98M29）中，出土了一件玉鹰，编号为 98M29:6，高 3.6 厘米、宽 6.3 厘米、厚 0.5 厘米。玉鹰两面的纹饰完全相同。腹部有类似 87M4 出土的玉版上刻划的八角星纹。两翅端部刻划了一个动物首形象。大多数学者都将其释读为猪首形象，因为凌家滩遗址发现有大量猪的骨骼，说明凌家滩人已经开始养殖猪。另外，凌家滩 07M23 墓上也压着一个大玉猪，有獠牙，完全是野猪的形象。

不过笔者在第一次看到这件玉器的时候，就直觉地认为这并不是猪的形象，而是熊的形

象，这是一件最早的“玉鹰熊佩”。

首先，熊的耳朵为圆耳，猪和野猪的耳朵都是尖耳，野猪还有外露的獠牙，而熊的獠牙不外露。再看凌家滩出土的玉鹰两翅的动物首形象——圆耳，张嘴，没有獠牙，明显首部更接近熊而不是猪。

在中国古代玉器发展的长河里，鹰与熊的组合非常之多，邓淑苹先生和郭大顺先生曾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的一件玉圭入手，分析过历史上的鹰熊组合，并且也认为凌家滩这件玉鹰两侧动物首是熊而不是猪。<sup>〔5〕</sup>

鹰是自然界飞禽中最凶猛的禽鸟，熊个体庞大，也是古人在自然界能遭遇的比人类凶猛的动物。人类会崇拜比自身强大的动物，但不会将已能驯化的猪作为崇拜对象。所以，这件凌家滩出土的玉鹰两翅表现为熊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猪，这是一件鹰熊佩而非鹰猪佩。

鹰熊的组合在后世文物中常常出现，例如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中发现的踏虎朱雀衔环玉卮，鑿耳上装饰着熊纹，而朱雀为神鸟，应是以鹰为原型。<sup>〔6〕</sup>

由对自然界鹰、熊的崇拜转而将其比喻杰



西汉 踏虎朱雀衔环玉卮及局部

安徽巢湖北山头西汉墓出土

图片采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6卷,第101页;  
南京博物院编《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第203页

出的人物,因而在文字系统中也有了“英雄”一词。虽然英与雄字的出现从甲骨文看可能和鹰、熊无关,但引申出来,英有“杰出”的意思,《孟子·尽心》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即指杰出的人物,《荀子·正论》也有“尧、舜者,天下之英也”。雄的意思也较多,或指杰出人物,或指强有力的国家或势力集团,并且还有杰出、超群、威武,雄壮之意。如《汉书·酈食其传》:“两雄不俱立。”《世说·规箴》:“帝虽才雄心忍,亦深有情恋。”李白《古风》诗:“虎视何雄哉!”等等。

将英雄一词相连目前看到最早的文献在汉代,汉荀悦撰《前汉纪》有“拥众收集英雄”“英雄诚知”之语。可见英雄一词至少到汉代已成为人们推崇对象的代称。

因鹰熊与英雄谐音,汉以后,以鹰熊图像来指代英雄寓意的文物多了起来。据传南宋画家李迪和明代画家林良都曾画过“鹰熊图”,元代诗文家周霆震写有《题鹰熊听涧图》诗。故宫博物院亦藏有明末清初邵氏画《英雄图》轴。清代乾隆皇帝在玉器上题写过两首英雄御题诗,一首《题古玉英雄佩》,明确写道“鹰熊刻佩拟

明 邵 英雄图轴  
绢本设色  
纵 157.7 厘米 横 75.2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英雄”<sup>〔7〕</sup>。这首诗被刻琢在一件龙山文化的玉圭上，目前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不论这件玉圭上刻琢的鹰以外的纹饰是否为熊，单从这首诗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以鹰熊比拟英雄，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在另一首《咏檀玉英雄如意》的诗文中，乾隆皇帝也直接点题：“鹰相其首熊相尾，寓意英雄畅指挥。豪气却当戒一往，要归于正在知几。”<sup>〔8〕</sup>

故宫博物院藏有多件鹰熊题材的玉器，最常见的是英雄合卺杯，此类合卺杯从宋代到清

代均有，造型、图案基本一致，均在双杯中间雕琢鹰立熊纹样，鹰在上，熊在下。此类双联杯的造型源头可追溯到战国时期，例如楚国墓中曾发现有凤鸟双联漆杯。清代还有更多的鹰熊题材玉器，如白玉子料英雄摆件，黄玉英雄瓶等等。除玉器外，珐琅、织绣、印章、铜器、竹木牙角等门类中也有类似图式器物。

鹰熊拟英雄，凌家滩玉鹰熊佩开后世英雄器的先河，也体现了英雄一词在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的最初来源。❧



宋 青玉合卺杯  
通高 9 厘米 单口径 3.6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明 青玉合卺杯  
高 9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青玉英雄合卺杯

高 22.8 厘米 单口径 6 厘米 底径 13×7.8 厘米 厚 10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带皮青玉鹰熊镇纸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黄玉仿古兽面纹英雄瓶  
高 12.6 厘米 口径 6.8×4.2 厘米  
底径 9×3.5 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 注释

- (1)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凌家滩——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 年。
- (2)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五次发掘的新发现》，《考古》2008 年第 3 期。
- (3)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编著《蚌埠双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 年，彩版 66-3 及第 339 页图。
- (4) 图片由安徽淮北市博物馆提供，在此表示感谢。
- (5) 邓淑苹、郭大顺《“鹰熊拟英雄”的考古学观察》，《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6 期。

- (6) 图片采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 6 卷，第 101 页图及南京博物院编《玉润中华中国玉器的万年史诗图卷》，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 年，第 203 页图。
- (7)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五集卷二十四，第九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611 页。
- (8) 《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五集卷六十五，第十册，第 225 页。